

領導者

LEADERS

總第35期



- 觀察 · 公眾對中美關係的看法為何有所不同
談談“中國模式”問題
- 智慧 · 胡耀邦與中央黨校“三次路線鬥爭”大討論
讀張木生
對蘇聯民族政策實踐效果的反思

我们更在乎气流，而非主流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敞篷跑车，梦幻上市

时而且听风吟，时而谈笑风生。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敞篷跑车，是延伸新一代E级轿车的动势外观，是彰显领袖精神的创新内涵，更是诠释敞篷跑车艺术的曼妙体验。全新梅赛德斯-奔驰E级敞篷跑车，配备全球首创自动挡风系统(AIRCAP)，配合创新科技头颈暖风系统(AIRSCARF)，营造畅怀惬意的敞篷空间；古典织物软篷，提速间亦可自如开合，令优雅瞬间蔓延；更有承自新一代E级轿车的多重人性化智能科技，令穿越四季的遐想，尽情敞开。

更多详情，敬请莅临梅赛德斯-奔驰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8-1188。

www.mercedes-benz.com.cn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目 录

·观察·

全球事务

- 11 谭青山 (美国) 公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为何有所不同
- 21 吴海杰 跨国企业和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主权
- 24 李小彬 请君三思还是请君入瓮
——全球金融危机时代的跨国企业与中国主权
- 28 Rajeswari Pillai Rajagopalan (印度) 跨国公司与中国主权

转型

- 33 林春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
- 52 陈子明 谈谈“中国模式”问题
——响应厚泽，纪念厚泽

案例研究

- 66 王赐江 基于不满宣泄的集群行为
——对三起非正常死亡个案演变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分析

·智慧·

- 74 约翰·刘易斯 (美国) 薛理泰 (美国) 1969年中国安危
系于千钧一发
——苏联核袭击计划胎死腹中 (下)
- 83 王海光 轻雷隐隐初惊蛰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
“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 (上)



CONTENTS

- 93 顾训中 中共党军体制的历史考察（下）
103 金雁 米洛舍维奇：
铁托的背叛者与南斯拉夫的掘墓人

来信讨论

- 116 János Kornai (美国) 创新与活力
——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上）
127 钟沛璋 中国离世界多远
131 周舵 谈谈恰如其分的民族自豪感
140 戴煌 身经磨难而矢志无摧的人
——评《红岩儿女·一生都在波涛中》

书评

- 148 刘源 读张木生
156 辛子陵 俄国十月革命的两副面孔
——尹振环著《列宁主义批判》序言
164 郑也夫 《陈子明文集》问世杂感
166 马戎 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
——读萨尼教授的《历史的报复》（上）

· 格调 ·

- 178 奢华如梦
——领略阿联酋航空公司A380头等舱
185 原色阿联酋
187 康生书法
192 绿色宝石之王
——祖母绿



内容提要



公众对中美关系的看法为何有所不同

美国公众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似乎更多地从与自身相关领域（如就业保障问题），而不是国家的角度出发。这就是为什么较少的美国人担心所谓的中国威胁，而更多地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忧虑和不安。因此，多数的美国人希望采取贸易保护政策来保障国内的就业。相反，对外国尤其是美国如何对待崛起中的中国问题，中国公众既有民族主义情感又有个人问题的担忧。

谭青山（美国）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在世界历史中定位的政治

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独立，扭转哈维所说的资本主义“空间修复”局面未必是空想：比如，通过“价格的政治”来提高工资，并向直接生产者提供保护价，从而给现存制度“加负”，导致削弱资本主义体系的实力。本来价格是由市场控制的，但市场因素可以被“政治斗争所建立的变数”所取代，从局部逐渐积累超越时代制约的力量。



林春

创新与活力

——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上)

文/János Kornai (美国)

引言

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本质仅用寥寥数语即可道出,那就是一大批国家从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一转变本身就是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最有力的历史见证。不过,我们有义务继续对这两种制度进行公正的、不偏不倚的比较。当前我们正处于困难时期,因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业已失败的旧制度更加念念不忘。我们必须使民众深信,我们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有很多论据可以支持这一乐观看法。我只想阐述资本主义一个方面的优点:它所具有的不断创新和充满活力的特质。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我将论述:迅速创新和活力四溢是根植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体制特性,而不是一个或有或无的随机现象。可以用同样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对立面——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之所以不能创造出重大的、革命性的新产品,并且在其他领域的技术进步也很缓慢,并非因为政策上出了差错,而同样是囿于其本身根深蒂固的体制特性。

不幸的是,资本主义的这个显而易见的重大优点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它反而被大多数人完全漠视,甚至大部分专门研究制度变迁的学者们

也是如此,对这种忽视我感到既生气又沮丧。本文的主题就是基于这个原因而确定的。

选择资本主义制度为一个国家的创新活动及更快速的技术进步创造了条件,也为该国利用这个机遇提供了更多机会,但这并不能保证立竿见影就会大获成功。在本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我将讨论转型期的种种问题。

“大转型”是若干进程的一个集合。

首先,政治领域发生了变革:一党专政变成了多党民主制。这一转变结束了马列主义思想受国家保护的特权,为多学派思潮的竞争开了绿灯。其次,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变革: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而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伴随着所有制形式的转变,各种协调机制的相对影响力也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央集权式的行政控制的影响越来越小,市场协调和其他分散化协调方式的影响力则越来越大。这些政治、经济领域的深刻变革连同其他变革一起构成了社会制度的变革,即由社会主义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

后社会主义地区在技术进步方面也经历了另一种变革。这里我用了

“技术进步”一词,因为我们似乎更习惯于这种表达。但是,按照我的理解,它所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更为广泛的现象。技术进步虽以新技术和新产品的涌现为基础,但其影响却远远超越了技术的范畴。作为现代化的一部分,它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进步”一词的含义会在本文的上下文中逐步揭示出来。当然,即便1989年以前,技术进步也一直存在着;只是1989年之后,技术进步的进程显著加快了。

在我们研究的领域,或其亚领域,所有后社会主义转型方面的专家都将注意力放在了政治、经济及社会变革上,将这些变革作为大转型的一部分加以研究。诚然,我们可能偶尔提及过技术进步,但没有对体制的改变与生产、使用新产品和新技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做过细致的研究。

当然,我自己之前也忽略了这一点。我曾写过两篇文章总结1989年后所发生的变革的主要影响,但只涉及了政治与经济变革及其相互影响(Kornai, 2001, 2006)。现在,我将之前遗漏的部分补上。因此,本文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的主题便是1989年后的体制变革与技术进步加速之间的

表1: 革命性创新

创新	年份	国家	公司
计算机、信息、通讯			
集成电路	1961	美国	Fairchild
按键式电话	1963	美国	AT&T
传真	1966	美国	Xerox
光导纤维电缆	1970	美国	Corning
便携式电子计算器	1971	美国	Bowmar
文字处理机	1972	美国	Wang
微处理器	1974	美国	Intel
激光打印机	1976	美国	IBM
调制解调器	1978	美国	Hayes
微软DOS操作系统	1980	美国	Microsoft
硬盘驱动器	1980	美国	Hard disk drive
图形用户界面	1981	美国	Xerox
笔记本电脑	1981	美国	Epson
可触式屏幕	1983	美国	Hewlett-Packard
手机	1983	美国	Motorola
鼠标	1984	美国	Apple
网络搜索引擎	1994,	美国	WebCrawler
U盘	2000	美国	IBM
Skype (网络电话)	2003	爱沙尼亚	Skype
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	2005	美国	YouTube
家庭用品、食物、衣服			
茶包	1920	美国	Joseph Krieger
手持电动吹风机	1920	美国	Hamilton Beach
插座	1920	英国	Rawlplug Co.
甩干机	1924	美国	Savage
烤面包机	1925	美国	Waters Genter Co.
电动蒸汽熨斗	1926	美国	Eldec
电冰箱	1927	美国	General Electric
家用空调	1928	美国	Carrier Engineering Co.
霓虹灯	1938	美国	General Electric
速溶咖啡	1938	瑞士	Nestle
电动干衣机	1938	美国	Hamilton Manufacturing Co
尼龙	1939	美国	DuPont
咖啡机 (高压)	1946	意大利	Gaggia
微波炉	1947	美国	Raytheon
汽车穿行餐厅	1948,	美国	In-n-Out Burger,
保鲜膜	1949	美国	Dow Chemical
涤纶	1953	美国	DuPont
不粘锅	1956	法国	Tefal
维可牢尼龙搭扣	1957	美国	Velcro
运动鞋	1958	英国	Reebok
卤素灯	1959	美国	GE
食品加工机	1960	美国	Roboot-Coupe
利乐包装	1961	瑞典	Tetra Pak
灌装饮料	1963	美国	Pittsburgh Brewing Co
保健、化妆			
创可贴	1921	美国	Johnson&Johnson
抽纸	1924	美国	Kimberley-Clark
纸巾	1931	美国	Scott Paper Co.
电动剃须刀	1931	美国	Schick
喷雾剂瓶	1947	美国	Airosol Co.
一次性纸尿裤	1949	美国	Johnson&Johnson

晶体管助听器	1952	美国	Sonotone
除臭剂	1955	美国	Mum
一次性剃须刀片	1975	美国	BIC
液体清洁剂	1982	美国	Procter&Gamble
办公			
透明胶带	1930	美国	3M
圆珠笔	1943	阿根廷	Biro Pens
修正液	1951	美国	Mistake Out
复印机	1959	美国	Haloid Xerox
便利贴	1980	美国	3M
运输			
电梯	1921	美国	Otis
停车计时器	1935	英国	Dual Parking Meter Co.
踏板车	1946	意大利	Piaggio
喷气式飞机	1952	美国	Comet
黑匣子	1958	英国	S.Davall & Son
休闲			
汽车电影院	1933	美国	Hollingshead
拍立得	1948	美国	Polaroid
随身听	1949	日本	Sony
电视遥控器	1956	美国	Zenith
乐高玩具	1958	丹麦	Lego
芭比娃娃	1959	美国	Mattel
石英表	1969	日本	Seiko
录像机	1971	荷兰	Philips
鲁比克魔方	1980	美国	Ideal Toys
CD	1982	荷兰、日本	Sony, Philips
便携游戏机	1989	日本	Nintendo
数码照相机	1991	美国	Kodak
在线书店	1995	美国	Amazon
DVD	1996	日本	Philips, Sony, Toshiba
商业、金融			
超市	1930	美国	King Kullen
购物卡	1937	美国	Humpty Dumpty Supermarket
大型购物中心	1950	美国	Northgate Mall
签帐卡	1950	美国	Diners Club,
信用卡	1958	美国	Bank of America
自动提款机	1967	英国	Barclays Bank
快递	1973	美国	Federal Express
条形码	1974	美国	IBM
电子商务	1998	美国	eBay

注：上表的条目是从更大的一组关于发明创新的调查结果列表中挑选出来的一部分。挑选的主要标准是与更多用户群体相关、广为人知，以及使用者不仅限于少部分专业人士。部分排除的标准是：(1) 这一列表仅包括熊彼特式创新，因此最早为了军事用途而被资助和使用的创新没有包括在内。(2) 医用产品，比如药品、医疗器材等未包括在内，这主要是因为从成百上千种新药品和新医疗器材中挑选出最伟大的创新实在比较困难。(或许今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将其纳入研究范畴。)

来源：部分条目来源于Ceruzzi (2000) 和 Harrison (2004, 2005)。每一个条目的来源均有记录，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相互影响。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 以及技术进步

革命性的新产品

复杂的技术进步进程是由几个

子过程构成的。我们先从一些突破性的、革命性的重大创新说起，表1列举了87个实例。^[1] (见表1)

如果我们想审视社会主义国家在创造革命性新产品上所扮演的角色，就必须回溯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的时代。因此，我将表中时期

的取值上限取在1917年。

自1917年以来诞生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创新。有人会质疑：我们或许还可以找到其他20个或50个意义同样重大的创新，但为什么偏偏就选了表中的这87个呢？虽然这些例子的选择可能具有主观性，但它们至少能

适当说明：所有这些创新都在不同程度上使人们日常的生活、工作、消费、娱乐以及人际交往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2]。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信息处理领域的变革、信息流动和通信技术等都在技术进步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不过，表1说明，当我们讨论技术进步时，仅仅讨论高科技领域的发展及其直接效应是不够的，办公室、工厂、交通、购物、家务以及教育的面貌都被技术进步改变了。家庭和工作场所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往返于两地间的交通方式也不同了——我们还可以继续举出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创新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永久性剧变和重构。现代世界因源源不断的创新而变得生机勃勃。正因为有了更多的深刻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创新，现代社会才比之前的年代更具活力。

在这87种创新中，有大约25到30种是关于计算机、数码产品和信息技术的。这一领域吸引了公众和学术界最密切的关注。研究“信息社会”产生的社会效应的文献数量每年都在快速增加（这一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成果可能来自于Castells, 1996-1998）。本文并没有深入探讨这一激动人心的领域，因为我想涉及更多方面的创新。表1列举的87类创新中，有将近60类创新与信息通讯领域的革命无关或者关系不大。毋庸置疑，信息通讯创新举足轻重，但是该领域外的许多其他领域也存在着并将继续产生一系列的创新。对于生活在贫困的阿尔巴尼亚或西伯利亚村庄的穷苦居民来说，电冰箱的引进或超市的兴建可能会引起他们生活方式的相应变化，而电脑的使用则可能是未来的事情了。我想从整体上探讨技术进步方面的问题，

无论这种技术革新与信息通讯革命相关还是无关。

发明引发创新。发明家们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专业或业余的研究人员，学者或工程师首先萌发了新的创意。但是，仅仅具有独创性和创新性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所以第二步，发明演变为创新：人们组织新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或将新的组织形式加以运用，这样便实现了发明在现实中的应用。

如果将注意力转移到第二阶段，即变革的具体实施阶段（表1标出了创新企业所在国），我们可以看到，最先引进创新的毫无例外都是资本主义国家。表中所列时间范围包含了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全部时间，很明显——没有任何创新始于社会主义国家^[3]。

技术追赶与创新扩散

虽然革命性的创新是技术进步最重要的部分，但是其他部分也同样不容忽视。有创新者就会有追随者。在原始创新完成之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时滞，许多其他的组织也开始在原始创新的基础上进行细微的质量改进，将虽小但不容忽视的发明推广应用，同时将创新予以传播。创新始于某个国家，随后在其他国家开始蔓延。

社会主义国家在许多领域都采用了始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开创性发明，其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候只是简单的模仿。对这些国家来说，照猫画虎般地临摹技术创新或许简单，但难的是怎么破解技术创新的秘密。尽管这些创新受专利和商业机密的保护，但为了获取技术，社会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对这些创新进行再创造，甚至有可

能不惜安插商业间谍，或窃取知识产权^[4]。然而，即便如此，社会主义经济在技术创新方面还是只能在资本主义后面疲于奔命，苦苦追赶。

有两个细节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创新落后（技术追赶方落后于技术领先方的幅度）要大得多（见表2及表3）。从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看，以年为单位计算的时滞大多未减反增。

其二，与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新产品和新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传播速度要快得多（见表4和图1）。

这里所列的图表，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在比较经济学文献中，可以找到大量经验证据来支撑这一结论：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创新追赶的进程相当缓慢^[5]。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创新企业家精神

历史经验提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所有的这些开创性创新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他领域所取得的技术进步也较社会主义为快。不过，让我们补充一个因果性解释，即关键的制度性差异导致了技术创新的差距。

资本主义制度下，企业家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6]。本文中的“企业家”的含义源于约瑟夫·熊彼特（1921/1934）的思想。此外，熊彼特关于发展和资本主义本质的理论在本文中也有所体现^[7]。（参见Baumol, 2002。他的书名《自由市场创新机器：资本主义增长奇迹的分析》正契合我要讨论的现象的本质。）

创新企业家精神是一种职责，一

表2:追随创新引领者的时滞:塑料制品

产品	创新	第一个追随者	第二个追随者	苏联	落后创新者的幅度(年)
玻璃纸	法国 1917	美国 1924	德国 1925	1936	19
聚苯乙烯	德国 1930	美国 1933	意大利 1943	1955-1959	25-29
PVC	德国 1931	美国 1933	日本 1939	1940	9
硅聚合物	美国 1941	德国 1950	日本 1951	1947	6*
环氧树脂	瑞士 1936	美国 1947	德国 1955 英国 1955	1957-1959	21-23
聚丙烯	美国 1957 德国 1957 意大利 1957	英国 1959	法国 1960	1970	13

* 在此例中苏联追随创新的速度快于资本主义国家。

来源: Cooper和Davies, 1977, pp.272-285。

表3:追随创新引领者的时滞:自动化控制

苏联开始研究		苏联(+领先;-落后)于			
		美国	英国	日本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开始研究	1949	-2	-1	+4	+6
第一个原型	1958	-6	-2	-	-
开始进行工业生产*	1965	-8	-2	+1	-1
第一个加工中心	1971	-12	(-10)	-5	-10
第一个第三代控制系统	1973	-7	(-5)	(-5)	(-5)
第一次使用电脑自动控制	1973	-6	(-4)	-5	(-4)

注: () 表示估计

* 每年至少生产50个

来源: Amann, Cooper和Davies, 1977, p.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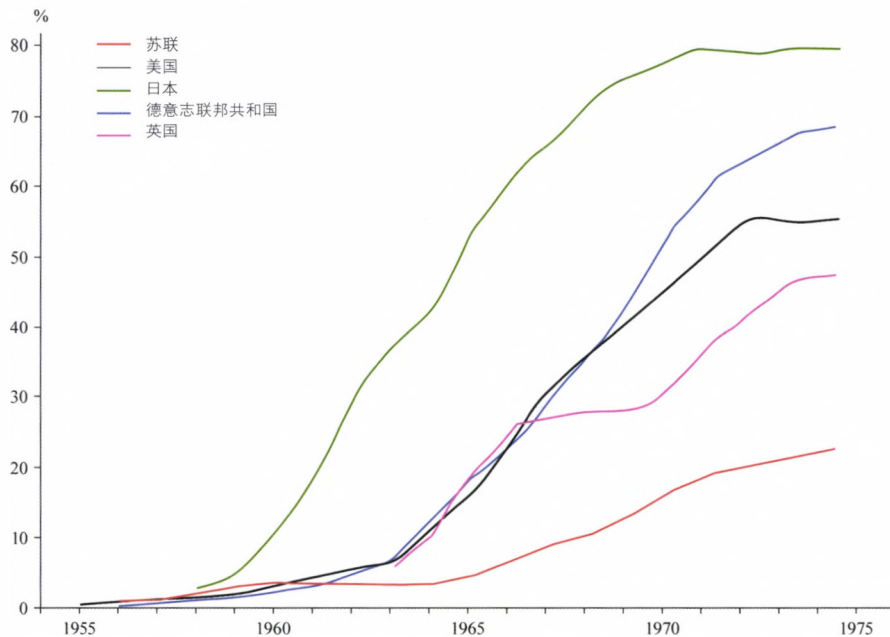
表4:现代科技的突破:钢铁工业,连续浇铸(百分比)

国家	产品中连续浇铸的比例		
	1970	1980	1987
社会主义国家			
保加利亚	0	0	10
捷克斯洛伐克	0	2	8
东德	0	14	38
匈牙利	0	36	56
波兰	0	4	11
罗马尼亚	0	18	32*
苏联	4	11	16
资本主义国家			
法国	1	41	93
意大利	4	50	90
日本	6	59	93
西班牙	12	49	67
英国	2	27	65
美国	4	20	58
西德	8	46	88

*1986。

来源:《金融与统计》(莫斯科), 1988, p.109。

图1: 现代科技的突破: 钢铁工业, 吹氧钢
(吹氧钢占总钢产量的比例, 百分比)



来源: Amann, Cooper和Davies, 1977, p.97。

种角色, 这种职责或角色能由个人或几人的团队来承担, 也能由一个小企业来行使。大型公司也可以行使企业家的功能。我的主要意思就是: 企业家是这样的人, 其所做的就是把创新所必要的财务和人力资源, 换言之, 创新活动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整合起来。他发现了创新的应用领域并具体指导实施了这一创新。一项有前景的发明往往都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被真正的创业者所采纳。(在罗杰斯1995年的著作中可以找到很多存在这种迟滞的例子。也可参考Freeman, 1982, p. 111-112。)也许有些时候发明创造与企业家之间彼此互不相知。但更普遍的情况是, 他们最终幸运地走在了一起。

从表1可以看出, 创新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形式: 不光是新产品或新的生

产技术, 还包括新的组织形式等。在多数情况下, 熊彼特式企业家在首次实现了革命性创新的同时, 也推动了创新的进程。追随原始创新的技术扩散进程也主要是企业家所推动的。

按照这一顺序, 最先出现的应该是首创精神。举例来说, 1996年, 斯坦福大学博士拉里·佩奇开始了论文选题的搜索工作。关于浏览网页的一些具体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和另一名学生塞吉·布林合作, 研发了一个“搜索引擎”。在斯坦福大学的主页上, 其域名为google.stanford.edu。这一事例中, 这两个人扮演了两类通常分开的角色: 他们既是发明家, 同时也是创新者。让我们跳过此创新发展的中间过程, 来看看它的现状。谷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且最富有的公司之一^[8]。其覆盖全球的网络使用了大

概45万个服务器。我不想玩弄文字游戏, 但事实证明, 谷歌的诞生具有革命性的意义^[9]。(后面我还会使用谷歌的例子, 但仅仅是为了阐述在资本主义环境下所发生的创新所具有的一般性。)

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资本主义经济所独有的一些特征, 它们不但使创新成为可能, 还引发并不断发展和推进了创新的进程。

A. 分散化的首创精神。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的导师并没有让他们去承担某一具体的创新任务。他们也不需要获得导师的允许才能从事某一具体方向创新活动。个人、小公司的决策者或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换言之, 在整个体制内运行的独立主体, 都能独立地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B. 巨额回报。佩奇和布林现在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10]。本文不会对收入分配在道德上的两难困境进行分析。到底多大的奖励才算与绩效“相匹配”呢? 有一点是肯定的: 最成功的创新往往(不总是, 但是经常, 有很高的概率)会给创新者带来巨额的回报^[11]。创新回报的大小呈很不均匀分布。在分布的末端, 你能找到比尔·盖茨或老一代福特家族和杜邦家族这样的豪富。引领技术进步的企业家可以获得巨额的垄断租金。他们觉得成为某个领域的第一人(即使是暂时性的)很划算, 因为那样可以取得在该领域的垄断地位。这不仅会带来滚滚财源, 声望, 名气和荣誉也会如影随形。

C. 竞争。这和上一点是分不开的。企业为了争夺客户, 每天都在展开激烈甚至无情的竞争。更快和更成功的创新也许不是赢得竞争的唯一方

法,但若想拥有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地位,创新依然极其重要。

D. 大量的尝试。可以肯定,曾有成百上千的企业家寻找过搜索网页的好方法,但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取得了像谷歌创始人那样的开创性成就。一些人通过创新也取得了程度不同的成功。还有更多的创业家虽然尝试过创新,却以失败告终。至今还没有人统计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领域不断进行的创新尝试的数量,以及这些尝试的成功或失败情况。其实,只要你对创新活动有所了解,凭直觉就能知道那些尝试的数量将是个天文数字,但最终像谷歌、微软、利乐、诺基亚或任天堂那样取得辉煌成功者则少之又少。虽然取得巨大成功的几率极小,但至少是有希望成功的,而取得一定程度上成功的概率相对就要大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天分很高的人甘愿冒着失败的风险从事创新活动的

原因。

E. 风险资本的存在与融资方式的灵活性。谷歌的两位创始人得到资金支持,使其能够实施创新活动并将其推广。安迪·贝希多斯海,一位成功的研究员与创新者(同时也碰巧是一位富商),在他们创新的初始阶段慷慨解囊,提供了10万美元的支持。

创新型企业很少有依靠自有资源成功的。虽然也有这样的例子,但依赖外部资源往往更加常见^[12]。融资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创业者可以申请银行贷款,也可以吸纳愿意投资该企业的投资者,还有专门投资于高风险项目并在成功时获得高收益的“风险投资”机构(Bygrave and Timmons, 1992)。基本上他们都需要有可灵活支配的资本是必不可少的,它有助于实现创新成果的问世和快速推广,在这一过程中包括了大量的尝试,而其中又会有很多以失败告终^[13]。

我并不是说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创新进程的唯一源泉,也还有不少未纳入熊彼特式分析框架中的,我仅简单的介绍其中三种。

(i) 在某些情况下重要的创新是由军事需求所引发、提供融资并予以实施的。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五角大楼表现出对实现完全分散化的通信服务的强烈需求。这主要是为了防止一旦邮政系统中心遭到破坏时,保证书面交流不会陷入瘫痪。军方的需求及其向这一研发方向所提供的慷慨的资金支持,导致了一场革命性的创新——E-mail的问世,它是一种完全分散化的有如“无形的手”指挥的通讯手段。尽管后来免费的、非营利性的邮件系统与更大意义上以商业利益为主的活动交织在了一起,但无论如何,E-mail都是非熊彼特式创新的一个经典范例。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尽管中央集权行政管理的国民经济中不存在竞争,但苏联及其盟国却不幸陷入了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美国的军事竞赛中。这场生死竞争对创新活动产生了很大的压力,最终也导致了很大创新的诞生。世界上第一颗卫星,The Sputnik,就是由苏联创造出来的。但领导层的总体目标是追赶甚至超越西方国家军事力量的发展,民用部门的技术进步只能为此让路,以致停滞不前。当把军事创新应用于民用用途时,社会主义制度的劣势再次显现了出来。美国通过卫星民用实现了军事领域创新技术的扩散,使远程通讯各个方面的质量和效率都得到了快速提高。而在苏联,这样的民用化则被耽误了很久。卫星的例子说



拉里·佩奇(右)和塞吉·布林(左),既是发明家,也是创新者。

明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可能会取得一些显著的成果——但伟大的创新却不能产生像分散化的、富有企业家精神的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大的外溢效应。

(ii) 某些情况下，重要的研究及其后的创新的扩散，是由政府的民用部门（例如负责医疗保健的机构），而非军事部门所发起并予以资助的。

(iii) 某些情况下，一些重要的创新是由特别研究小组、社团或非政府组织发起和执行的。伟大的、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发明——万维网就是这样诞生的。（参见The memoirs of the pioneer, Berners-Lee, 1999.）计算机领域许多其他的创新、数码产品、信息和通信技术都始于这种民间发起的、非营利的、协作式的非熊彼特式创新。

上述非熊彼特式创新是值得我们肯定的，但要知道，大部分的开创性创新活动还是遵循了熊彼特创新模式。对于定位于消费产品和服务市场，以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为主的创新，遵循熊彼特模式是正确的选择。即便创新过程始于非熊彼特式模式，但创新技术的扩散也主要是通过营利活动来实现的，其中大部分是由愿意从事商业活动的创新者所承担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诞生创新企业家精神

让我们转而探讨社会主义，我们从创新的前一个阶段——发明开始讲起。社会主义国家也有很多创造性的人才，那里的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做出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要发现或发明，而且这些发现或发明本可以应用于工业和商业。举例来说，苏联

物理学家艾布拉姆斯·约菲（Abram Joffe）在科学史上被尊为半导体的先驱之一，我们知道半导体是现代电子工业的基础。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就发现了半导体。只是当时的经济环境不允许这种创新应用于工业领域。很久之后，半导体的生产被美国、日本、中国台湾及韩国所主导——苏联远远落后于他们，沦为了向创新国学习的技术追赶国家^[14]。

波兰工程师、科学家加塞克·卡尔平斯基（Jacek Karpinski）在1971~1973年间发明了第一台微型计算机。他被公认为计算机技术领域的一位先驱人物。但是当他居住在波兰的时候，他的发明没能成为一项广泛传播的创新。后来卡尔平斯基移居国外，他的发明创新在与其它类似发明的竞争中，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得到了普及。

匈牙利最有名的例子要数鲁比克魔方了。我将这一精致玩具列入了众多突破性创新之中，因为我相信它在其中应占有一席之地。它的发明者厄尔诺·鲁比克发现，每一个人在学会了玩这个智力玩具以后都爱不释手，于是尝试着将其推广到全世界，但反响平平。后来，一家著名的、真正拥有企业家精神的美国玩具公司将其买下并进行了世界范围的营销。自此，魔方才取得了惊人的成功。

用于个人电脑的塑料制品——软盘是一种数据存储装置，它拥有成千上万的使用者。它最早是由匈牙利工程师马塞尔·亚诺西（Marcell János）发明的，这一点即便在匈牙利也鲜为人知。亚诺西在1974年发明它后，将很好用的产品原型提供给了匈牙利企业和出口商，结果却是徒劳一场；社

会主义工业部门的领导者没有看到这一发明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他们不愿冒险进行大规模生产及世界范围的推广，甚至都不支持对其加强专利保护。发明者也不被允许自行进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营销推广。最终，一家日本公司“重新发明”出了软盘，并最先实施了对这一创新产品的大规模生产^[15]。

介绍完饱受挫折的发明者的悲惨故事后，让我们回到创新阶段。诚然，即便是在社会主义体制中也有很多人具备企业家才能，但无奈英雄无用武之地。假设某项大工程的负责人被选中担任这一职位是因为他的能力而非政党关系，那么也许他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其才能。然而，体制的内在特性抑制了熊彼特式企业家才能的发展^[16]。

刚才我们探讨资本主义制度时，谈到了它的几个有利于创新的条件。现在，让我们逐一看看一下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方面的情况。

A. 中央集权、官僚指令与许可。在社会主义国家，技术创新计划是国家计划的一部分。中央的计划制定者负责制定最重要的指标。他们明确规定各种产品的生产比例、质量标准以及生产技术。中央计划再向下细分，就是部门计划，分部门计划，最后直至公司计划。“指令经济”就是指企业接到上级的详细指令，指示什么时候用新产品替代旧产品，什么时候用新机器设备和新技术替代旧机器旧技术。

在计划最终获批之前，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对计划建言，因而他们能够首先提出引进新产品或新技术的建议，也就是说，他们能参与创新



国营工厂，“指令经济”。

的扩散。但是，在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活动付诸实践之前都必须得到上级的许可。如果恰好有一个大规模的创新活动，大到中层官员自己都不能做主审批，中层官员只好继续向更高一层的官员上报。影响层面越大的创新活动，就要得到越高层次官员的批准，这样，在创新启动前走的审批程序就越多（对于集权与创新关系的理论分析，参见 Qian and Xu, 1998）。

反观资本主义制度，由于决策分散化、私人产权和自由市场的存在，一项非常有前景的创新即便被一家公司拒绝，也还会有另外一家公司愿意采纳它。在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任何创新计划的实施都要走官方审批程序，一旦被上级否决，那么这个创意也就胎死腹中了。

B. 零回报或少量回报。社会主义

经济是存在奖金的。不仅个人收入高低有别，形形色色的正常或特殊津贴也的确存在。如果上级主管部门认为某一工厂的技术创新非常成功，那么该厂的经理及其同僚们便会得到一份奖金，其数量至多相当于他们一到两个月的工资。

C. 生产商与销售商之间缺乏竞争^[17]。生产高度集中，很多企业在一整类产品的生产中占据垄断或者至少是区域垄断的地位。长期的产品匮乏造成了垄断，即便很多厂商同时生产时也是如此。社会主义体制典型特征之一的短缺经济，使得创新的强劲引擎陷于瘫痪，企业失去了争夺消费者的动力（Kornai 1970, 1980, Kornai 1992, Chapters 11-12.）。生产商和销售商没有动力提供更新或更好的产品以吸引顾客，因为对于后者而言，能够

从商店买到商品就很知足了，哪怕是过时的劣质产品。

有很多因长期短缺而引发创新活动的例子：如紧缺的物资或机器配件的设计巧妙的替代品(Laki, 1984-1985)。但发明家们创造性思维的结晶，并没有转化为广泛传播的熊彼特意义上成功的商业创新^[18]。

D. 对尝试的严格限制。资本主义允许成百上千的无效或收效甚微的尝试，以最终实现无数次试验中的一次突破并进而带来巨大的成功。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人人都尽量回避风险。于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性创新的实施或多或少受到抵触，因为创新之路前途未卜，其成功与否往往难以预料。

就技术追赶国家而言，有些国家跟进很快，而其他国家则相对缓慢。社会主义经济属于跟进速度最慢的

一类国家。他们宁愿维持已知的、旧的生产流程，生产那些经试验证明效果良好的过时产品——而新技术、新产品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使得领导层的计划变得非常困难。

E. 缺乏可利用资金，投资分配僵化。中央计划中对用于资本积累的资源的配置并不吝啬。依据总产出确定的投资分配一般都高于资本主义经济。然而，这一巨额款项已经提前规划好了每一分钱的用途。事实上在多数情况下都存在着过度配置，换言之，所有的项目计划合在一起所申请占用的资源超过了实际执行计划所必需的数量。根本不存在可供有创意者使用的闲置资本。负责分配资金的官员不会去寻找试图将创新想法付诸实施的企业家。灵活的资本市场不为人所知。相反，却产生了对项目活动的教条的、官僚式的监管。向结果难料的创新活动去投资，这种想法简直是匪夷所思。在为创新活动融资之时，没有哪一位工业部长或工厂经理会愚蠢到事先就坦承，创新可能不会成功，投资者的投资可能收不回来等^[19]。

谈到这里，让我们再一次回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A到E那五点。两种制度下创新机制的差异正是源于两种制度基本特性的差异。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私人产权和市场协调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有产权和官僚协调机制，直接导致两种制度下创新形式的差异。

我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仅仅取决于其实行的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制度或社会主义制度。其他许多因素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

平（包括对研究人员的培训）、资助学术研究和产业研发的制度框架和资助数量，军方资助的研究活动等等。当然，运气无疑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例如，诺基亚在移动电话销售上取得了空前成功，至于它为什么是出现在芬兰，而不是丹麦或挪威，就只能归因于运气了。许多文献探讨了创新过程中先发者和追赶者这方面的问题（如 Davila, Epstein, and Shelton, 2006, Freeman 1982, Rogers 1995）^[20]。必须承认上述所有解释因素的作用，同时我要重申自己的观点：制度特性的影响十分显著^[21]。

政治因素和技术进步

经济中制度特性的影响是解释创新过程本质的决定性因素，而这一因素最终又是由制度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因此，政治结构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直接的联系。我简单地谈几点。

共产主义独裁政权大力推进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创新活动，以实现其政治宣传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传播。列宁是最早意识到媒体宣传作用的政治家之一。苏联也是引进广播电视最迅速的国家之一，因为它们起初是一种能够实现高度集中的媒体，制作播出只集中于一个或几个工作室，并且处于政党的严格控制之下。此外，广播电台的节目也易于控制，通过大喇叭甚至可以传播到遥远的村庄。

只要严格的集中控制是可行的，广播和电视就会受到共产主义政权的支持。所幸的是，随着集成电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完全的集权管制和审查制度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了。柏林曾经垒起了一道防止人们穿越两国

边界的墙。但是没有一堵墙可以阻止广播和电视信号穿越铁幕从西德传到东德，从慕尼黑传至整个东欧。为防止西方传媒造成社会动荡而对其进行进行的信号干扰，只能算是一种比较蹩脚的手段。社会主义体制的垮台自然是多方面的因素所造成的。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与来自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信息彻底隔开在技术上的不可能性，便是其中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阵营最后的骚乱发生于这些国家也能使用复印机、电子邮件和互联网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呼唤过Glaznosty（公开性）。随着对互联网、电子邮件、广播和电视信号的开放，国外的信息源源不断涌入；后来，更多的信息则来自于那些觉醒的国内开明之士。这最终摧毁了那些陈旧的教条、僵化的信仰和误导性的政党宣传，解放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思想（Shane 1994, Kedzie 1997a and 1997b, Stolyarov 2008）。

关于政治结构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后文会继续进行探讨。

初步总结：制度与技术进步

暂且假设马克思、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构想得以实现，世界革命在全球取得了成功，资本主义没有任何残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永远不会拥有电脑或晶体管收音机、冰箱还有超市、互联网、电梯、CD或DVD、数码相机、移动电话及其他所有革命性新产品。我们的生活方式，至少是在许多设施的使用方面，会或多或少的停滞在资本主义被最终打败前所处的水平。

这里涉及到了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长期发展趋势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在人类活动（不仅是生产活动，还包括所有其他个人和社会活动）中用到的技术（工具、设备、装置等）是在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将这个复杂的过程简称为“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其他特性是由几个因素决定的。本文的基本思想（包括我的其他文章）是：制度是解释技术进步的最佳因素。制度和科技进步之间存在很强的因果关系，制度类型（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原因之一，技术进步的速度和其他特征是结果。

虽然我用的是“技术进步”这个被经济学界广泛接受的概念，但我们必须留意第二个词——“进步”，它听起来极具褒义。它反映了一种价值判断标准：居住在一个拥有自动洗碗机、移动电话和CD的世界比没这些东西的世界要好。但事实确实如此吗？没有人会不经思索、毫无保留地回答“是”，即使他是现代科技最狂热的崇拜者。凡事都有两面性，自刀

和火出现以来，人类发明的每一件新工具和新科技都既被用来行善，也被用来助恶。生活中细微但极重要的一个事实便是：科技进步浪潮，即计算机、电子、数码产品、现代信息和通信科技的蓬勃发展，也可以被罪犯、性骚扰者、恐怖分子以及极端政治运动所利用，它同时也为误导（至少是烦扰）人们的广告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机器人代替人类完成工作导致了很多人活动及交往的“非人化”。孩子和成人本应用在更有价值的学习和娱乐上的时间，被日夜玩电脑和看电视所占用。技术进步已经并将继续服务于和平，同时它也可能被用于战争——既可以用于保家卫国，也可以用于侵略他国。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愿意称这种技术变化为“进步”——因为相对其缺点和危险而言，它更多的是给人们带来了福利。（稍后我会引用数据证明这是大多数人的观点。）

基于这个价值评判准则，我认为资本主义对技术进步的促进是这个

制度最大的优点之一，而社会主义对技术进步的阻碍是其最大的缺点之一。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我们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而拍手称快。（未完待续）

（相关简介：János Kornai，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吴文韬、连洪亮翻译。本文发表于UNU-WIDER“转型的反思：柏林墙推倒20周年纪念”国际会议上。在此，特向Julian Cooper, Zsuzsa Dániel, Zolt Fekete, Thomas Geodecki, Philip Hanson, Jerzy Hausner, Judit Hürkecz, Lószló Karvalics, Zdenek Kudrna, Mihály Laki, Lukasz Mamica, Tibor Meszmann, Dániel Róna, András Simonovits, Katalin Szabó及Chenggang Xu致谢，感谢他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他们在收集数据和资料方面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长期的支持及其提供的激励性研究环境，以及Hédi Erdős, Rita Fancsovits, Katalin Lévyayné Deseő, Anna Patkós, Ildikó Pető, Andrea Reményi和László Tóth在编辑本文时给予的帮助。）

注释：

[1]关于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文献对“新产品”和“新技术”进行了区分。这两个范畴的外在表现形式往往是紧密相连。例如，影印机是一种新产品，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新的印刷技术。表1列举的是一些新产品，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新产品往往更易被人们所感知。

[2]在选取例子时，本文排除了一些特定类型的创新。至于排除的标准，部分在表1下方已有说明，其他部分将在下文中逐一予以阐述。

[3]表1未包括始于经济领域中军事部门的创新的情况，因为以巩固一国军事力量为目的而引进的创新完全属于另一回事。在军事部门，我们会发现始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创新。后面我会再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4]若干限制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社会主义国家窃取西方国家高科技领域的知识产权，例如，严格禁止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某些产品（所谓的COCOM对用于军事用途产品的禁运名单）。尽管有严格的限制，还是有很多聪明的间谍与技术专家合作，成功的钻了漏洞。

[5]这个方面最重要的实证研究来自Amann, Cooper and Davies (1977, 1982)。同时也可以参见Berliner (1976), Hanson (1981), Hanson and Pavitt (1987)。

[6]并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都是创新者(Baumol and Schilling, 2008)，本文只关注企业家中至关重要的一类，即投身创新活动的这类企业家。

[7]关于熊彼特对社会科学贡献参见Hertje (2006) 和 McCraw (2007)。

[8]关于谷歌的准确介绍，请查阅谷歌公司自己的摘要(Google, 2009)或在维基百科谷歌词条(2009a)。

[9]基于个人经验，我承认谷歌也改变了我的搜索习惯。作为谷歌时代的研究员与之前的古藤堡时代的研究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10]根据著名的福布斯杂志财富排名，二者财富之和在美国位列第五。

[11]谷歌的事迹可以看成是一个特例，发明者和创新者是同一批人。在其他例子里，发明者和创新者常常不是同一批人（这种例子更常见）。在有些例子里，发明者因发明而获得巨额回报，而有些例子里发明者则没有从发明或发现中得到一点好处。鼠

标就是这种情况，发明鼠标的人Douglas Engelbart没有获得任何金钱上的回报。而苹果公司作为创新者，因普及了鼠标的使用而获取了巨额利润。

[12]毫无疑问，多创新时期的经济繁荣与可用信贷的迅速增长有着必然的联系。充裕的资金链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同时也形成了泡沫风险。要分析当前危机之前的历史，我们有必要重读熊彼特的著作（参见Schumpeter 1939，尤其是第四章）。我很想就这一方面展开一些讨论，但篇幅的限制使我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

[13]试验在发明与创新进程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只有在大量失败的尝试的基础上才能诞生新的发明。这一阶段后，众多可行的有用发明之中，有一件脱颖而出并发展成为成功的商业创新（关于试验的重要性，参见Thomke 2003）。

[14]起初约菲被授予了国家最高奖励并享有很高的学术荣誉。但是在斯大林恐怖统治末期，他被视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遭免职。无论是起是落，其发明终未能转化为革命性创新。

[15]这位匈牙利发明家至今健在。退休后他一直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参见 Story of the floppy in Kovács (1999)和Drávcz (2004)所写的关于软盘的故事。

[16]经验研究见注5。理论解释见Berliner (1976), Gomulka (1983) and Kornai (1980 and 1992)。

[17]如前面所述，国防产业是个例外，因为在该领域，苏联与西方国家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

[18]不仅社会主义遭受长期短缺，在战争时期，资本主义同样会出现短缺。二战时期，原材料的短缺刺激了用以弥补日常原材料不足的人造材料的创新。

[19]关于融资灵活性、中央集权与创新之间关系的分析，参见Huang and Xu, 1998。

[20]对于那些对创新的实际问题感兴趣的商务人士和管理人员而言，引用最多的文献可能是Rogers (1995)。这本卓越的、用心写作的名作甚至都没有提到熊彼特的名字，也没有其他关于创新的经济理论。

[21]德国分裂后的经验很有启发性。与捷克斯洛伐克接壤的东德是最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有着非常好的研究基础，并且把很多资源用于高等教育、学术和工业研究。但是，它却无法贡献出哪怕一项革命性的创新。虽然东德有很多一流的、技术精湛的专家，但其大部分部门在追赶领先的技术创新方面都要慢于西德 (Bauer, 1999, Stokes, 2000)。

領導者

LEADERS

總第36期



- 觀察 · 美中關係或面臨拐點
東亞安全形勢和中國的選擇
中國人如何看日本列島
也談“中國模式”
- 智慧 · 唐山地震的啓示：從公民權利看央地關係

岁月不改 天地不移

梅赛德斯-奔驰 G 500 越野车

如同真理，从来颠扑不破。我们用30年时间证明，真正的经典无需为潮流而改变，它是过去、现在，以及未来。
更多详情，敬请莅临梅赛德斯-奔驰当地授权经销商，或致电400-818-1188。

www.mercedes-benz.com.cn



领导者 LEADERS

《领导者》成就

中国第一本针对领袖人群的高端杂志。精装，印制设计精良。2004年创刊。创新发行方式——由推荐者出资订阅，提出受赠名单，经《领导者》订阅资格审定委员会审定后，寄达受赠人。《领导者》在大中华（中国大陆、港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限量发行20000册，每册均编号，附有受赠人和赠送人的名讳，《领导者》对受赠人和赠送人实行一对一的贴身服务，随时满足服务对象的个性化要求。

《领导者》因对全球政经形势的前瞻性思考，严谨求实的历史态度，以及对于中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和高度的责任感及使命感，深获其读者的尊重、喜爱和欣赏。

《领导者》定位

内容定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战略性全局性的观点和思考；全球化进程态势的分析和研究；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世界著名领袖的传记；科学和艺术；高端人群关注的医疗、健康、出行、收藏、置业等，大都是中国大陆难得一见的深度分析和资讯。

目标定位：影响最有决策权的阶层。

作者定位：全球各地资深研究人员和有独到见解的知名撰稿人。

《领导者》主要栏目介绍和部分精彩文章

● 观察（目察秋毫之末，耳调玉石之声）

世界顶级智库对中国未来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报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战略性全局性的观点和思考，全球化进程态势的分析和研究。

- ☆ 评估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
- ☆ 评周小川的货币政策理念
- ☆ 中国能源不安全分析
- ☆ 货币改革再造中国

● 智慧（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

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世界著名领袖的传记，科学和艺术。

- ☆ 关于林彪的几个断想
- ☆ 改革论争中的农民地权问题
- ☆ 对父亲纪登奎的点滴回忆
- ☆ 邓小平印象记

● 格调（其知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高端人群关注的生活、健康、出行、收藏、置业等。

- ☆ 古堡
- ☆ 雪茄时间

《领导者》读者的评价

这是一本放眼世界的杂志，这是一本尊重历史、恢复历史本来面貌的杂志，这是一本用事实说话、讲真话的杂志……

时下的中国不缺杂志，但缺好杂志，而《领导者》是好杂志之一。领导力的强弱，取决于洞察力、思维力的深浅，而《领导者》可以为领导人提供有益的助力。

祝贺您主办了一本如此成功的杂志，并祝福杂志越来越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为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与合作作出更大的贡献。



欢迎订阅《领导者》杂志

www.21ccom.net
www.共识网.net

我 订 阅 _____ 年 _____ 月 至 _____ 年 _____ 月

订 阅 数 量 _____ 份 共 _____ 册 合 计 _____ 元

是否 需要 发 票： 发 票 收 据 票 据 抬 头 _____

付 款 方 式 邮 局 汇 款 银 行 转 账 上 门 收 订

姓 名 _____ 电 话 _____ 手 机 _____

电 子 邮 件 _____ 传 真 _____ 邮 编 _____

公 司 名 称 _____ 部 门 _____ 职 务 _____

收 刊 地 址 _____

个性化服务示例



赠 阅 人 _____ 受 赠 人 _____ 先 生 女 士 电 子 邮 件 _____

受 赠 人 公 司 _____ 部 门 _____ 职 务 _____

电 话 _____ 手 机 _____ 传 真 _____

收 刊 地 址 _____ 邮 编 _____

订阅方式

出版周期：双月刊 定价：150元/期 全年6期 每期192页 全年订阅价900元人民币；接受跨年度订阅

1. 刊社直接订阅

收款人地址：北京市亚运村北苑路180号加利大厦A座501室 邮 编：100101

收 款 人：领导者杂志社

2. 银行转账

开 户 行：建设银行北京分行安慧支行

户 名：北京一杉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银行帐号：1100 1018 5000 5607 9478

3. 上门收订

北京的读者朋友，只需要拨通电话：64958795，告知您的信息（姓名、地址、邮编、联系电话、起止期数、是否需要发票）在五个工作日内，我刊收订员就会和您联系并上门为您服务。

请将订阅单及汇款凭证传真或邮寄至《领导者》杂志社北京联络处。

订阅热线：010-64958795 64961765 传真：010-64961661 联系人：修林 杨春红

E-mail: yuxiulin2006@hotmail.com



Mercedes-Benz
The best or nothing.

目 录

·观察·

全球事务

- 13 薛理泰 (美国) 美中关系或面临拐点
22 周永生 东亚安全形势和中国的选择
30 Willy Lam “天安”号事件：
中国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加剧
41 吉原都市 (日本) 詹姆斯·R·霍尔姆斯 (美国)
中国人如何看日本列岛
44 唐世平 联盟政治和中国的安全战略

转型

- 46 林春 (英国) 也谈“中国模式”
53 方绍伟 (美国) 产权国家论：
经济发展的逻辑与“中国模式”的前景
67 谭青山 (美国) 村级选举为什么
没有大幅改善村级治理

案例研究

- 73 顾训中 上海富国皮革污染事件中
环保NGO的积极作用
78 李波 马军 参与式环境冲突解决机制的NGO尝试

焦点

- 80 宗教自由与族群和谐之道

·智慧·

- 96 张千帆 唐山地震的启示：
从公民权利看央地关系



CONTENTS

- 104 王海光 轻雷隐隐初惊蛰
——胡耀邦与中央党校
“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下）
- 115 丙丁 民盟“临大”
——为把中国造成一个
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设想蓝图

来信讨论

- 125 János Kornai (美国) 创新与活力
——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下）
- 135 徐滇庆 拉丁美洲的民粹主义及其教训
- 143 秦晖 一个老知青看“民族命运与个人使命”
- 154 王贵秀 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反思
- 161 章立凡 迷失的现代化
——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怪圈

书评

- 167 马戎 对苏联民族政策实践效果的反思
——读萨尼教授的《历史的报复》（下）

读者之语

- 174 刘猛 城市化与契约精神

·格调·

- 176 陈逸飞笔下的婉约与雄浑
- 182 奢华舒适的“巨无霸”
- 186 拨开云雾见青天，2010中网最终尘埃落定
- 188 大隐百世传 盛世窖煌香
- 190 窖煌美酒赋



创新与活力

——制度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影响(下)

文/János Kornai (美国)

转型与技术进步的加速

进入资本主义世界后,后社会主义国家都对企业家精神、开拓性创新、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快速传播等敞开了大门。经济基本特征的转变为这些国家技术进步的加速创造了条件。

在字里行间我尽量小心翼翼。资本主义有着倾向于企业家精神、创新及活力的内在趋势,但这仅仅是一种趋势、一种倾向、一种天性,仅此而已。它不像是物理定律,必须被赋予实质。前面对于资本主义体制下创新问题的讨论强调了,除了体制特性这一决定性影响因素外,其他方面也对创新有显著影响。这些非体制特性因素的差异解释了各转型国家创新进程在速度上的不同。企业家精神、创新活动及内在活力通过人类的活动又都重新活跃起来。上述趋势所取得的突破能走多远、能以多快的速度进行,主要取决于人类所创造的社会、政治及法律环境。它依赖于商业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潜在企业家的勇气、灵感与能力。

新的创新型企业家

让我们从引进革命性新产品的创新开始。第一个例子是在表1伟大的革命性创新中所提及的网络电话

Skype。网络电话的两位发明者都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尼可拉斯·詹士庄是瑞典人,乔纳斯·弗里斯是丹麦人。但是将其进行世界范围推广的公司最初却是在爱沙尼亚建立并注册的。因此,根据本文所适用的准则,我们所讨论的是一项爱沙尼亚发明。它是如此成功以至于美国的e-Bay花了将近20亿欧元才将其收购,并继续创新进程。

第二个例子匈牙利高科技公司Graphisoft,它可能没有那么著名,但依然值得称赞。发明家兼创新者盖博·博加,某学术研究机构前资深研究员,开发出了一种主要供建筑人员使用的三维立体设计程序(Bojár, 2007)。虽然他的软件在这一领域并非独一无二,但与其他软件相比却显得更加优质、高效,因而在许多国家都取得了商业成果。博加的公司现在正在对该产品进行世界范围的推广。这是熊彼特式企业家生涯的一个经典例子。两位匈牙利人的命运是如此之悬殊:身处1989年之前的软盘发明者亚诺西未能取得成功,穷困一生并且默默无闻;而Graphisoft的创办者博加在赢得荣誉的同时创造了亿万财富。

第三个例子是关于从损坏的硬盘里恢复数据的。这个例子也是发生在

卡达尔时代的匈牙利,那个以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著称的年代。当时匈牙利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计算机,但价格却十分昂贵。如果一台计算机坏了,人们一般不会随便丢弃它最重要的部分——硬盘。在对硬盘进行修复后,将它和其他旧部件装配在一起,重新组装成一台电脑是值得的。加洛斯(János)和山多尔·库提(Sándor Kürti)两兄弟掌握了修复硬盘的特殊技巧,并由此萌发了一个创意:如果存储在硬盘上的数据丢失了,不是可以用同样的技术将其恢复吗?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过丢失电脑上大量信息后的痛苦经历。库提兄弟掌握了那门技术,更准确的说,一门从损坏的硬盘中恢复那些本以为永远丢失了的信息的技能。在1989年之后,这项技术已被应用于市场上。库提兄弟成立了一家公司,用自己的技能又培训出了一些专家。现在他们的客户遍布全球。这是熊彼特式创新者的又一个成功案例。

虽然以上三个例子有两个来自匈牙利,但通过我本人与熟悉这些案例的人士的交往,我深信在其他后社会主义转型国家中同样发生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不可否认,这种成功的案例目前仍然是屈指可数,后社会主义地区要想出现更多的伟大的创新也尚待

时日。

技术追赶与扩散的加速

后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扩大其私人部门的同时，也建立了市场协调机制。这些国家还通过多种途径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其中包括更快从其他国家引进创新。

过去几十年里，家庭电话在西方国家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电话服务的供给严重不足，且只提供给特殊阶层，普通民众要安装电话得等上好几年！中央计划的制定者未考虑优先发展电信事业，对电信部门的资源配置严重不足，最终造成电话线路供给的匮乏。这样看来，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电话服务这种供需失调关系就无

望得到改善。后来，制度发生了变革，电话部门的面貌也随之焕然一新。表5显示，在相对较短的时间里，每个人都用上了老式的有线电话。此后，一项革命性的新产品——手机出现并迅速占领了电话市场（见表5、6、7和8）^[1]。电信服务以疾风骤雨般的速度发展了起来。现在，电话的使用已不受供给的约束，唯一有效的限制来自于需求方。

资本主义与电话服务的充足供给在多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因果关系。向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私人所有制的转变，彻底结束了短缺经济。电信服务得以发展是因为国内外的企业家能够从中获利。手机对有线电话具有很大程度上的替代性，使得有线电话业务无法继续维持其垄断地位。恰恰

相反，电话公司之间出现了激烈的竞争。30年前，在苏联或东欧，潜在的顾客为了安上一部电话，需要请求电话公司的关照。而现在，电话公司极力寻求顾客的光临。

而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因为家里没有电话而带来的麻烦。我很感谢后社会主义转型及资本主义，现在不光我家里装了电话，我的亲人们也都有了他们自己的电话。我很感谢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程度的提升。我知道，“感谢”是经济学与政治学词典中所不再使用的词汇。但我想用的正是这个单词，因为它不仅准确地传达了我对资本主义与革新在总体上所呈现出的正面的因果关系、对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特别是电话服务的普及）的理性认识，更体现了我对1989

表5 电话拥有量：比较数据（每千人中拥有电话的人数）

年份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波兰	罗马尼亚	苏联	德国	希腊	意大利
1979	91	53	53	67	67	308	226	216
1980	102	58	55	73	70	332	235	231
1985	167	70	67	88	103	416	314	305
1990	242	96	86	102	140	441	384	387
1995	305	210	148	131	169	514	494	434
2000	353	372	283	174	218	610	536	474
2005	323	332	307	203	280	661	567	431

来源：联合国统计数据，2009。

表6 欧盟国家的现代通信技术突破

15个老欧盟国家（EU15）与10个新加入欧盟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之对比（EU10）

指标	度量单位	国家组	1995	2001	2007
GDP	人均，以2000年美元作价	EU15	19,706	23,747	26,781
		EU10	3,469	4,425	6,295
GDP	人均，PPP，以2005年美元作价	EU15	25,831	31,134	35,058
		EU10	9,758	12,286	17,570
个人电脑	每百人	EU15	16	35	37
		EU10	3	12	33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EU15	3	32	64
		EU10	1	14	48
宽带用户	每百人	EU15	NA	2	24
		EU10	NA	0	12
手机用户	每百人	EU15	7	77	116
		EU10	1	40	118

注：数据是每组国家的简单平均。详细数据请参考来源。

来源：世界银行（2008）。

年后所发生的变革的强烈感情。尽管转型有不足也有失败，我仍要由衷地庆祝转型20周年，庆祝资本主义诞生的一个重要理由在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终于能够拥有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所有产品。

表6、7、8列举的其他几类同样重要技术的扩散进程——电脑的使用、因特网的普及等，揭示了同样的结果。向创新国家学习的速度有了极大的提高。

很多企业家以创新者为榜样，结合当地的具体环境将他们的创意加

表7 欧盟国家的现代通信技术突破

5个维谢格拉德国家 (V5) 与3个南欧国家 (S3) 之对比

指标	度量单位	国家组	1995	1997	1999	2001	2003	2005	2007
GDP	人均, 以2000年美元作价	S3	10,406	11,020	11,847	12,642	13,054	13,623	14,289
		V5	3,865	4,194	4,435	4,756	5,108	5,635	6,338
GDP	人均, PPP, 以2005年美元作价	S3	18,620	19,721	21,200	22,618	23,345	24,357	25,545
		V5	11,550	12,535	13,228	14,176	15,237	16,821	18,956
个人电脑	每百人	S3	5	7	9	14	15	17	28
		V5	4	6	9	12	18	23	39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S3	1	3	10	16	26	33	41
		V5	1	2	6	13	29	39	50
宽带用户	每百人	S3	NA	NA	0	1	3	8	14
		V5	NA	NA	0	0	1	5	11
手机用户	每百人	S3	3	12	40	74	88	100	115
		V5	1	4	14	46	72	92	113

注: 数据是每组国家的简单平均。V5包括: 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 S3包括: 希腊、葡萄牙、西班牙。

来源: 世界银行 (2008)。

以应用而取得巨大成功。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 就是这类熊彼特式伟大创新者的一个例子。该集团下属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企业间电子商务 (B2B), 特别是小公司间的业务。目前, 阿里巴巴集团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在世界范围内也名列前茅。其创始人及领军者马云, 起初是一名高中老师, 后来通过努力成为了亿万富翁 (参见 <http://www.alibaba.com> ——公司信息)。阿里巴巴是个极为成功的例子, 后社会主义世界还有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创新故事。

总而言之, 最发达国家与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差距虽然没有消失, 但已日渐缩小, 这与社会主义时期两者间差距越拉越大形成了鲜明对比^[2]。

创造性毁灭

创新过程是与企业进入与退出市场的动态进程紧密相连的。熊彼特

表8 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现代通信技术突破

指标	度量单位	国家	1995	2001	2007
GDP	人均, USD	俄罗斯	1,618	1,870	2,858
		巴西	3,611	3,696	4,222
		墨西哥	4,892	5,864	6,543
GDP	人均 PPP	俄罗斯	7,853	9,076	13,873
		巴西	7,727	7,910	9,034
		墨西哥	9,949	11,927	13,307
个人电脑	每百人	俄罗斯	2	8	NA
		巴西	2	6	NA
		墨西哥	3	7	NA
互联网用户	每百人	俄罗斯	0	3	21
		巴西	0	5	35
		墨西哥	0	7	23
宽带用户	每百人	俄罗斯	NA	0	3
		巴西	NA	0	4
		墨西哥	NA	0	4
手机用户	每百人	俄罗斯	0	5	115
		巴西	1	16	63
		墨西哥	1	22	63

来源: 世界银行 (2008)。

将后者称为“创造性毁灭”, 精确而简练地描述了技术快速进步中不可分离的两面。企业 (特别是成功的创新企业) 进入市场固然可喜, 但是, 如果没有诸如破产、商业失败、企业退出以及随之而来的下岗和失业等这些

令人悲伤的事情, 就没有迅速的技术进步。转型经济体不幸地经历了两次大的创造性毁灭浪潮。在前期的文章里, 我将第一次创造性毁灭称为转型衰退。那次衰退重创了所有的后社会主义国家, 造成大量的企业倒闭, 并

使过去几十年里一直维持过度就业和工作保障的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大规模的失业。当前这次衰退尚未结束，略带乐观地估计一下不远的将来，产出也许会有所下降，但绝不会像第一次转型衰退期那样严重。那次衰退或许是经济史上最大的衰退之一，但却没有引起人们像这次衰退那样的重视——因为只有我们，也就是前社会主义地区才是转型衰退的受害者，其他国家并没有承受这样的痛苦。

转型衰退带来了可怕而高昂的代价，但也不无裨益。它迫使转型国家快速调整，以应对内外部市场结构的根本改变，也为建立更有活力、更具创新和更高产能的体制扫清了障碍。很多过时的生产线、冒烟和生锈的工厂、货源短缺的商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全新的现代化的厂房、高科技生产车间、崭新的超市和购物中心。

有关后社会主义地区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数据非常翔实。Bartelsman, Haltiwanger及Scarpetta (2004) 的论文以公司层面的数据为基础，对24个国家的创造性毁灭进程做了详细的分析报告，其中包括几个转型国家——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罗马尼亚以及斯洛文尼亚。此处仅以一张表格简单予以说明（见图2），该表涵盖了在20世纪90年代拥有20名以上员工的企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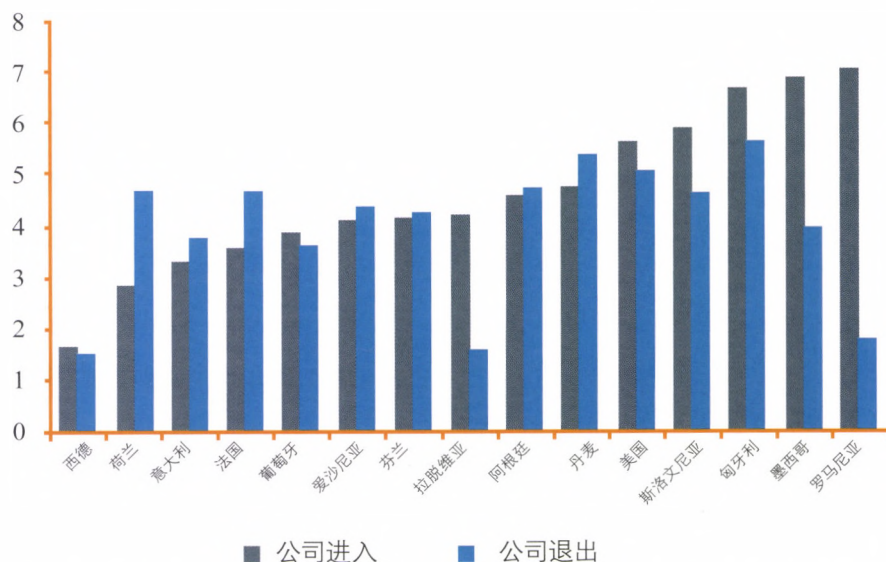
在转型的初期，进入市场的企业数量远远超过退出的数量——这与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不同，在市场经济中两者的差距通常要小一些，而且可能是负值。很多大企业（之前的国有企业）倒闭了，同时又有大量的小企业兴起。总的企业流动率（进入率+退出

率）在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为3%到8%之间，而在20世纪90年代的某些转轨经济体中则超过了10%。

由于新创企业流动快速、生命周期相对较短而给市场造成的冲击，后来慢慢平息了下来。到20世纪9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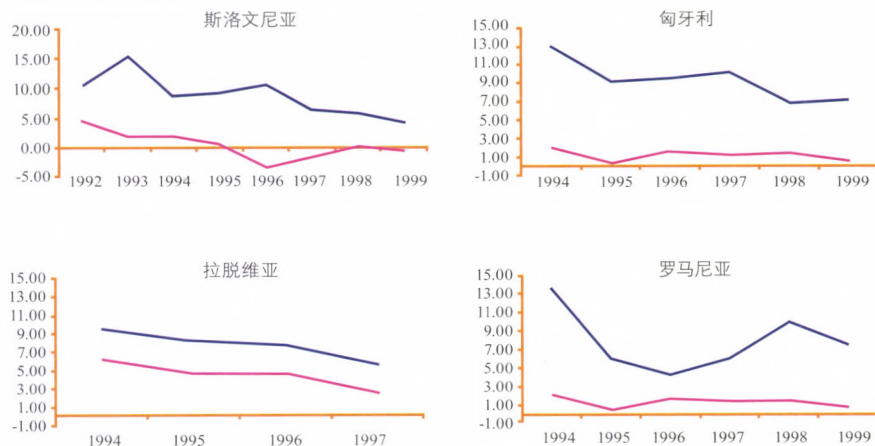
末期，转型国家中企业数量的相关统计数据，已基本接近于其他国家。从图3可以看出，进入退出比呈现出向均衡比例发展的趋势。红线越来越靠近零点的位置，而零点表明以员工数量为权重的进入退出比正好完全相等。

图2 1990年代公司的进入和退出率



注：蓝色柱体表示进入率，即该年进入市场的新公司占该年公司总数的比例。紫色的柱体表示退出率，即该年退出市场的公司占前一年公司总数的比例。
来源：(略)。

图3 经济转轨过程中公司数量的净变化



注：上表的计算涵盖了整个商业部门。黑线表示总变化（进入率+退出率），红线表示净变化（进入率-退出率）。
来源：(略)。

后社会主义国家花费了若干年时间，好不容易渡过了熊彼特进程中最困难的毁灭阶段，开始以不断提高效率实现增长并生产出最新的产品组合。但突然间一场新的外部冲击——全球经济衰退——又一次冲击了该经济。此刻，这个地区的人民正经历着第二次痛苦的经济衰退。可以理解，此刻，“资本主义”一词难以在后社会主义国家民众中引起共鸣。

从熊彼特理论来看，目前的衰退除了引发动荡和痛苦外，是否也能起到扫清障碍的效果呢？现在问这个问题还为时尚早。这次毁灭是否为后社会主义国家日后更好的建设扫清了道路呢？后社会主义今后十几年间的发展将对这一问题做出充分的回答。

关于上面所做积极描述的政策含义，需要另外一篇较长的文章才能说清楚。本文所能做的仅是简述几个可选的政策方案，以及选择这些方案时遇到的两难境地。

1.接受熊彼特关于创造性毁灭的基本观点，并不意味着对于毁灭的所有具体表现都不假思索地予以认同。如果盲目的市场力量导致一家企业破产，那么某些机构（中央或地方政府，金融部门或其他主体）可能会考虑对其实施救助。这里我们遇到了论述软预算约束及道德风险的文献中所涉及的宽泛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我在多篇文章中都对此问题做过讨论。在此，我补充一点：熊彼特创新过程往往伴随着最有发展前景和最“新潮”部门和子部门的快速增长（还记得大批“.com”公司的问世和成长吧）。这个创新过程不可避免地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要取得为数不多的巨大成就，就必须启动很多项目；而另一方面，

项目往往启动得太多。接下来就面临“自然选择”的过程了——我们不能为注定要灭亡的物种的生存而战。为了避免大规模的企业破产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会强烈建议对一些企业实施救助。然而，我们也必须仔细考虑一下，拯救这些本该被淘汰的企业会产生什么负面效应。

2.关于近期衰退之原因的争论还在继续。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将其归咎于金融部门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同时也强烈呼吁更为严格、更为保守的信贷准则的实施。我不反对这种观点，但同时我也要提醒大家，熊彼特式创新进程需要一个相对宽松的融资渠道来支持那些有风险项目，这些项目有可能失败，也有可能极大地促进技术进步（参见熊彼特式创新必要条件的调查中的D、E两点）。和衰退前相比，人们普遍显得更加谨慎也更加厌恶风险。我承认，现在我们的确需要比以前更加谨慎——但是，如果盲目地采取极其保守的态度来应对衰退，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需要仔细地、有区别地制定信贷标准，以保证那些虽有风险但是前景广阔的创新项目能够获得融资机会。

3.我们听到加强监管的呼吁以及对市场力量约束不够的警告。这些呼吁和警告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超过了这个度，我们就可能会陷入过度监管的境地，行政审批对创业的阻碍，将会浇灭企业家创新的热情。在不少后社会主义国家，创业仍然如同一场艰难的障碍赛[见世行和国际金融公司（2009）的商业活动报告]。政策制定者们要避免两类错误：监管太松，或监管过度（或不当）。

4.很多商人和高管收入的激增令

普通民众感到十分不满。有人呼吁对他们的高收入采取实质性的限制措施。这种想法于情于理都可以理解。不过我想给一个不合时宜的提醒：创新成功后的巨额回报是熊彼特式创新过程的必要条件之一（见上述条件B）。注意，是巨额回报！这无疑激励了那些潜在的创新者去承担较大的失败风险。我们需要明确，在本文中，可以称为“创新者”的不光是引进突破性创新的开创者，还包括那些迅速追随国内外开创者的企业家。另一方面，很难想象能有一位正直能干的仲裁者，能在应得与不应得的高奖励之间划出一条合理的界线。我不准备提出一个可行之法，而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高业务收入的完全矛盾的两个方面。

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

基本现象：缺乏理解

在本文的前面部分，我描述了“大转型”（即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相互影响的历史事实。我的描述或许会有偏差，但我坚信是基本正确的，因为证据很充足。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对历史事实的描述和历史事实在人们头脑中的映像这两个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映像形成过程。对于前文描述的历史事实，人们是基于他或她的社会地位、教育背景、个人经历和性格特征来认知、理解和评价的。

我们要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技术进步。对于过去和未来出现的发明、创新、新产品及新科技，人们是怎么看待的，视其为一种进步还是

一种祸害或威胁?就此问题,我们在19个国家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查;从表9和表10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趣的启示。在技术进步有益还是有害的问题上,三分之二的波兰和匈牙利受调查者认为技术进步的正面效用要更大。从调查结果看,这两个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居民更为肯定技术进步的作用,持肯定态度者的比例要高于奥地利、芬兰、西班牙和意大利以及同样是后社会主义的捷克居民。而当问到技术进步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时,持肯定态度的受访者比例大幅增加。(见表9的第五列,表10的第一列。)

第二个问题不是着眼于评价,而是关于因果关系。我斗胆做了一个大胆的推测,即大部分后社会主义地区的居民不了解资本主义和技术进步之间的因果关系。尽管过去50到100年的创新,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革新极大地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使大多数人享受着技术快速变化的好处,但人们并不把这种改变归功于资本主义^[3]。反而有一大批人存有些许甚至强烈的反资情绪,却不知道日常生活中的移动电话、互联网、超市里的商品条形码、塑料制品、合成纤维、现代家居设备以及复印机等,无一例外都是由他们所鄙视或讨厌的资本主义制度赐予的。

遗憾的是,那仅仅只能是个推测,因为我无法找到任何独立调查、民意测验或价值调查来支持、修正或推翻此推测。在助手的帮助下,我试着仔细查阅了各种最权威的调查^[4],却发现:在对被调查者所提的上百个或多或少与此相关的问题中,没有人以任何形式问过这样的问题:你怎样

看待社会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与技术进步之间的相互作用?

除非得到第一手调查数据,而该数据又能够揭示人们心中对此问题的真实看法,且能得出结论迫使我修正这一推测,否则我会维持刚才的推测。调查的缺乏似乎以某种特殊的方式间接地支持了我的推测。如果专门研究如何认识社会变革及民众对变革的态度的研究人员都完全忽略了这

一类问题——我们还能期望普通民众思考过这个问题吗?如此重要的问题就没人开展过相关调查,这清楚地表明,对于思考政治和经济领域与技术进步加速之间的关系,人们漠不关心。

舆论是在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进程中形成的。父母、幼儿园和小学老师、我们的邻居及同事,都是此进程的参与者。我想评价一下那些对舆论形成负有特殊责任的人群。

表9 技术进步的价值(百分比)

	科技进步将有助于治疗艾滋病、癌症等疾病	科技进步可以以为后代创造更多机会	科技进步使我们的生活更健康、轻松和舒适	科技进步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困和饥饿	科学的好处大于坏处
奥地利	82	71	71	33	48
芬兰	89	77	77	21	50
意大利	82	73	76	50	57
西班牙	79	66	73	37	57
波兰	89	93	83	45	65
匈牙利	94	81	79	34	63
捷克	85	74	70	35	44

注:题目是:“你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此表反映了所有受访者中持肯定观点的人数比例。

来源:欧洲晴雨表调查(2005)。

表10 对新技术所产生的影响的期望(百分比)

国家	下一代能享受质量更高的生活	太阳能	电脑和信息技术	生物和遗传工程	网络	手机	电动汽车可使用的新能源	空中运输
EU15	47	90	85	63	77	67	90	79
EU10	72	84	87	64	81	70	86	79
德国	75	95	89	65	75	57	92	72
英国	82	91	92	65	81	61	90	80
匈牙利	82	87	87	74	78	67	81	75
波兰	91	89	92	63	86	80	88	88
罗马尼亚	83	78	86	65	82	75	84	85

注:题目是:“你是否认为以下新技术会带来正面、至少是中性的作用?”此表反映了持肯定答案的人数比例。

来源:欧洲晴雨表调查(2005)。

经济学界的责任

我们教了什么东西给学生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熊彼特的启发，增长理论产生了令人激动的重要的新进展，并且已经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这种赞同经常流露在彬彬有礼的脚注中，但它对主流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还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杰出的经济学家在解释资本主义的优点时特别强调企业家精神。奥地利学派最近的代表人物们不懈地强调市场自发力量的创新本质。研究比较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及后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学家们专注于探究制度特性和技术进步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然而，大量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却没教给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们这些有价值的思想。

让我们做一个简单但很有说服力的试验：我们查一查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入门课本。以曼昆(2001)写的教材为例，它在美国是最常用的教材之一，也被翻译成其他若干种文字，在我的祖国匈牙利也被作为教材。这是一本经典的教材，对重要的观点都展开了有趣的阐述。但是，书上却找不到对熊彼特创新过程的任何叙述，连一句话也没有。书后索引里的数十个人名中，也没有熊彼特。书中倒是要素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有些苍白无力的论述，但既没有生动描述创新过程，也没有阐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活力，这个缺憾无法弥补。

在我的研究助理Judith Hürkecz的帮助下，我们还查阅了五本在美国、欧洲(包括匈牙利和其他后社会主义国家^[5])更为流行的教科书。结果同样令人失望，我们对曼昆教材的上述评价同样适用于这五本书。

我不想匆忙下结论，因为肯定会

有重要的例外。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企业家精神和熊彼特观点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学者(以及其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持相似观点的人)正在教授微观经济学，他们肯定不会忽视对创新过程的解释，也不会忘记阐述资本主义制度在激发开创性创新中所扮演的角色。

当然，那五本书的例子并不具有代表性。囿于本人精力和本文篇幅有限，我无法分析太多数量的代表性教科书以得出恰当的结论。但是除非遭到实质性的反驳，否则我将维持先前的假设：对资本主义的这个极端重要的制度特性，大部分(可能占主导地位)的高等教育没有对其进行充分的阐述。

主流经济学经常被人诟病为宣扬资本主义优点的经济学。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的经济学教育可真够失败的，竟然遗漏了对这个制度最主要的一个优点——具有永不停歇地大规模创新的倾向——的阐述。

GDP已经成为衡量增长的主要指标。对GDP给出一个全球统一的可操作的定义和衡量方法，是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一大贡献。但如果人们仅仅用这个指标来评价经济成功还是失败，那就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了。人们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了GDP的增长率上，忽略了其他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指标：如通货膨胀，财政平衡，经常账户，社会平等程度等。然而，对于本文中的技术进步，至今还没有公认的指标来度量其成功或失败以及加速或放缓。在中东欧后社会主义国家，GDP在1994年到2000年左右才恢复到1990年前夕的水平，事实上，在一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恢复进

程更慢，有的甚至至今还低于那个水平。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些国家大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得到彻底改变。在本文中，我说的改变不仅限于政治环境、收入分配和社会稳定状况的改变，除了这些非常重要的改变之外，我还指由资本主义创新过程创造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在这些国家的迅速应用。我们抱怨GDP的低水平——但不要忘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通过电话和互联网与外界相通，更多的人用上了汽车和现代家居设备，也使用着许多之前只属于西方世界的其他新产品。我们应该寻找一种合适的方式，以公允、合理地表现出技术进步对日常生活的影响。

经济学家及经济统计学家都意识到需要完善对GDP的核算，通过与其他指标相结合来综合反映福利与社会发展等其他方面的情况。我们正采取一些重要的新的手段，以改进对增长的测算，将总产出数据和反映医疗、教育、收入分配等情况的指标结合起来分析^[6]。我担心本文所强调的——技术进步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会再一次被忽视，而未得到其应受的重视。

政治家的责任

不言而喻，政治家们负责政府政策的制定。前面的分析能否在政策上得以体现，取决于政治家们的决策。但是此刻，我想对政治活动的另一方面做些评价。政治领袖也是一国的教育者。在我的助手Tibor Meszmann及几位住在匈牙利外的同事的帮助下，我们参阅了以下国家的政治领袖所作的一些公开演说：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匈牙利、波兰、塞尔维亚、

斯洛伐克及斯洛文尼亚。我们选取的政治领袖是这些国家的总统、首相或最有影响力的反对党领袖。我们尽量选取了反映一国成功与失败（例如美国的国情咨文）的演说或公告，这类演说或公告多在重大节假日或重大事件期间公布。我们所分析的文本大多是在2009年的前8个月中所公布的，我们还偶然找到了一篇庆祝1989年大转变20周年的演说，该演说对后社会主义转型作出了整体的评价^[7]。

总体而言，在53篇演说或公告中，没有一篇谈及资本主义与技术进步的因果关系以及技术进步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资本主义的这一优点从未被详加阐述，以说服人们相信：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充满创新、现代化以及活力的世界。

有几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演说中谈及技术进步时，肯定了资本主义的作用，但没有进行具体解释。通过对这53份演说的分析，我们深感震惊和失望。我们选取的政治领袖不是反资的极右派或极左派，而是代表东欧政治“根基”（establishment）的领导者。他们交替执政或成为反对派，但绝不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而是朋友——然而，他们却没有找准力挺资本主义的最佳论点。

我们补充一点，极少的政治领袖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他们（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往往都强调制度的阴暗面，并对其公开批评。

当然，我们应该参考更多的政治演讲或书面声明。我需要任何新的材料，包括反例，即那些强调资本主义在催生创新上的作用以及将技术进步的加快视为转型成就的演讲。但是，只

要还没被驳倒，我将坚持我的观点：因为疏于对“资本主义→创新→改变生活方式”这个因果关系进行阐释，朝野各界的政治家们都应该对此负有重大的责任。理解了这个关键的联系，就能有效地驳斥反资观念——而我们的政治领袖们显然失职了。

当然，这可能是一时之失。最使我恼火的是那些反资的民粹主义者——他们一边享用着资本主义催生的发现或创新，一边却煽动人们反资。那些政治活动分子使用着个人电脑、手机和通过卫星或光纤提供的通信渠道，来鼓动人们参加反资集会，参加抗议游行。对此，我极其反感。后社会主义地区正在出现这样的情景：那些对社会制度已经改变这个基本事实甚至都加以否认的政治活动家们，在博客和网站上打出他们民粹主义的反资口号，通过扩音器向大众发表煽动性的言论，通过手机来互相联系，殊不知他们自己使用的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科技。

网络互联和民主

人们心目中究竟怎样理解和评价“资本主义→创新→生活方式改变”这个因果联系？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逆向思考一下，即思考技术进步（更具体地说，信息通信领域的进步）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治观点的影响，我们能得到一些启示。关于后社会主义的受访者对民主、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表11、12和13总结了调查的数据。在表格中，我们把人群分为两类：经常上网的与不经常上网的。其差别相当显著。相比之下，那些与现代IT技术紧密相连的人，更加赞同资本主义和民主，对过

去的政体也更加不满。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互联网的使用者对过去的社会主义制度没有太多怀念之情，但这种恋旧之情在有些人心中却日渐强烈，尤其是这次经济危机爆发以来。

上面所述的实证结果较好地吻合了另一组关于“网络互联”的研究结果。顾名思义，互联是指个体间通过各种技术设备和手段而相互联系在一起。这方面E-mail起了很大的作用。能够给他人发送E-mail的人越多，这一连结网络就越紧密。这一现象既可观测也可计量。

我在这里主要参考了Christopher R. Kedzie (1995) 的很好的论文。他用公制 (metric) 对互联进行了计量。因为我本人并非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无法判断在Kedzie的研究中，使用公制是否为所能采取的最佳办法。在有条件地接受了他的方法后，他研究的基本结果自然就值得一提了。除了其他方面的计算外，他还分析了“民主”（由多指标加以度量）与“网络互联”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其相关性为0.73，比民主与人均GDP的相关性（0.57）要强。由于缺乏互联指数的计算过程中所涉及领域的相关知识，在介绍这一命题时我有所保留。Frisch (2003) 近年的研究支持了Kedzie的结论。希望这一方向的研究能够继续。

此刻，我重提前面所论述过的，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在肢解共产党及正统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力量中发挥的作用。前面我所研究的是20年前在前苏联及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事件。但其说明的问题并未过时。有两个小国——古巴及朝鲜，其经济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强权的共产主义专政依然存在。还有两个大国

表11 对民主的满意度

按是否使用互联网对人群进行划分

国家	互联网用户		非互联网用户	
	平均值	百分比	平均值	百分比
中东欧	2.6	30	2.8	70
捷克共和国	2.5	42	2.8	57
匈牙利*	2.2	23	2.4	77
波兰	2.7	34	2.9	66
俄罗斯	3.0	14	3.1	86
斯洛文尼亚	2.2	57	2.1	43

注：百分比表示互联网用户或非互联网用户在该国所占比例。问题是：“你对民主的运转有多满意？”答案被分为4个等级：1=完全满意；2=比较满意；3=不太满意；4=完全不满意。此表反映了结果的平均值（未加权）。

*对于匈牙利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结果，我持保留意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据显得过低了。（JK）

来源：（略）。

表12 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评价

按是否使用互联网对人群进行划分

国家	互联网用户		非互联网用户	
	平均值	百分比	平均值	百分比
中东欧	1.9	30	0.4	70
捷克共和国	2.5	42	0.7	58
匈牙利*	0.7	23	-0.5	77
波兰	1.1	34	-0.9	66
俄罗斯	0.9	14	-0.8	86
斯洛文尼亚	1.6	57	0.7	43

注：百分比表示互联网用户或非互联网用户在该国所占比例。问题是：“你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多满意？”答案从-10分到0分，再到10分，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中性，再到非常满意。（未加权）

*对于匈牙利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结果，我持保留意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据显得过低了。（JK）

来源：（略）。

表13 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评价

按是否使用互联网对人群进行划分

国家	互联网用户		非互联网用户	
	平均值	百分比	平均值	百分比
中东欧	1.1	30	3.7	70
捷克共和国	-2.6	42	0.6	58
匈牙利*	0.2	23	3.0	77
波兰	-0.4	34	3.4	66
俄罗斯	1.6	14	4.4	86
斯洛文尼亚	3.0	57	4.0	43

注：百分比表示互联网用户或非互联网用户在该国所占比例。问题是：“你对社会主义制度有多满意？”答案从-10分到0分，再到10分，表示从非常不满意到中性，再到非常满意。（未加权）

*对于匈牙利的互联网用户的调查结果，我持保留意见。与其他国家相比，这个数据显得过低了。（JK）

来源：（略）。

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改革，使其经济基本接近于资本主义，但其政体却没发生什么变化，依然是一党专政。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这些国家又有些什么影响呢？中国和越南渴望充分利用技术进步革命性成果所带来的所有益处，但同时也担心其潜在的影响。领导层的两大目标——最大化技术进步的收益，同时最大化对垄断权力的保护——是完全自相矛盾的。因此，两国的领导层首鼠两端，进退两难。

另一个值得分析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进步的前景：即将来临的创新浪潮和生活方式之间将会有怎样的相互影响？

悲观时，我会预见各种坏的场景。无须预测未来的特殊才能，我们也很容易就能预计到，有些技术成果可能会被不当使用。我读过几篇报告，是关于中国政府采取行动，对互联网内容进行政治审查，还封杀了几家视频网络并关闭了一些言论不当的博客^[8]。既然中国使用的电脑越来越国产化，那么很容易强迫企业在新电脑的操作系统里安装能够集中控制的审查软件。遗憾的是，西方国家的大厂商因害怕失去中国巨大的市场，竟乐意配合当地官员引入这项政治审查软件。

60年前，当奥威尔写《1984》这本书的时候，“老大哥”还不拥有小说中所设想的那种装置。但现在，在每幢公寓和办公室安装摄像头或窃听装置在技术上已经没有任何难度。想象一下未来的“斯大林”用最新的监控和通讯装置监控所有人的情景吧！

乐观时，我就会摆脱那种噩梦般的设想。我希望，无论独裁者怎么集中权力，现代科技都能引领我

们一次又一次地将其分散。如果独裁者发明一种新的封锁信息的方法,也会有成百上千的分权主义者(decentralizators)和有发明才能的电脑用户冲破其信息封锁和壁垒^[9]。

结语

我的文章涉及了很多话题。我没打算将研究局限在某个或某两个主题上。我们所探讨的,是本应绚烂多彩的比较经济学与后社会主义“转型学”研究中所存在的大片空白区域。本文的目的在于对这一空白区域予以概述。

对于与本文几个论题相关的大量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某些成果在本文中有所提及。但问题在于,每一个主题都有其独立的庞大的文献体系,而这些课题彼此之间却完全独立,未曾互相援引。链接是现代通讯中的一个关键术语和关键技术手段(一般是加下划线的蓝体字,以帮助我们

从一处文本跳到下一处),很不幸,对后社会主义在政治、经济、舆论、技术、信息通讯等方面变革的研究,彼此之间并没有有效地链接在一起。我建议建立它们之间的链接——这样,各领域的学人也许能从中得到新的重大启示。我没有在本文中插入真正的链接供大家点击——但我至少试着激发大家的想象力去思考应该在哪儿置入链接。我的重点不是给出某个链接的具体描述或分析,而是希望大家对研究课题之间的相互联系有个总体印象。

还有很多在本文中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涉及的主题,也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实证观察和理论分析。对技术进步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在不同层面上仍在继续着。本文所讨论的观点只是定位于其中的一个层面,我很清楚在我研究的这个领域之外还存在着很多相关的层面^[10]。

我要是再年轻一点就好了,有着充沛的精力对这一空白领域进行细致

的探索。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激动而又富有挑战的研究课题啊!希望我的文章能够激励他人进入这一未被研究的领域。无论如何,我将继续研究制度的政治经济维度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L

(相关简介: János Kornai,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吴文韬、连洪亮翻译。本文发表于UNU-WIDER“转型的反思:柏林墙推倒20周年纪念”国际会议上。在此,特向Julian Cooper, Zsuzsa Dániel, Zsolt Fekete, Thomas Geodecki, Philip Hanson, Jerzy Hausner, Judit Hürkecz, László Karvalics, Zdenek Kudrna, Mihály Laki, Lukasz Mamica, Tibor Meszmann, Dániel Róna, András Simonovits, Katalin Szabó及Chenggang Xu致谢,感谢他们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以及他们在收集数据和资料方面提供的帮助。还要感谢布达佩斯高级研究所长期的支持及其提供的激励性研究环境,以及Hédi Erdős, Rita Fancsovits, Katalin Lévaýné Deseő, Anna Patkós, Ildikó Pető, Andrea Reményi和László Tóth在编辑本文时给予的帮助。)

注释

[1] 在某些国家,例如匈牙利,这不仅阻止了有线电话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事实上在很多家庭中手机已经取代了有线电话。

[2] 根据综合反映“资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资讯社会指标],许多后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捷克共和国、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排名(Karvalics, 2009)。这些国家的排名在不断上升,各指标得分也逐年提高,要知道,仅维持现有排名就需要极大的努力。

[3] 在前面的部分,讲到社会主义制度下电话线路的供给不足和1989年之后的过量供应时,我个人对此现象有个评论:感谢资本主义给我生活带来的变化。也许我不是唯一拥有这种想法的人,但我担心,有我这种想法的人只占少数。

[4] 我们查阅了四个最著名的跨国调查,寻找上面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却未能找到任何与上述问题内容相似

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已被记录,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5] 这些教科书的书名,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6] 法兰西共和国总统邀请了一批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由Joseph Stiglitz, Amartya Sen及Jean-Paul Fitoussi负责,对增长与发展的测量方法提出新的改进意见。目前他们正在撰写报告的初稿。

[7] 如需相关文本的具体清单,请与作者联系。

[8] 见Chao (2009)和Timmer (2009)关于中国加强政治审查的工作。要了解大体情况,请在维基百科上输入internet censorship词条查看。

[9] 在前面的脚注中,我提到了Timmer发布在网上的文章。编辑向我征求对该文的意见。这是我的第一条评论:怎么阻止中国人格式化硬盘和安装盗版Windows软件?

[10] 我简单的介绍几个本文所未提及的维度:

——新信息通讯技术对个人、社会群体、定居地、国家或州之间的关系有何影响?高科技信息通讯与单一民族国家及其国际化有何关系?

——资本主义的未来。新信息时代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基本属性发生剧变?是否会诞生一种不能再称为资本主义的新体制?(两位匈牙利经济学家Katalin Szabó和Balázs Hítori在2006年写了本有趣的书,副标题如下:数字资本主义还是新经济制度?还可参见Haug (2003)。)

——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性变化如何影响了商业(特别是金融部门)?

——新信息时代对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有何启示?

——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向:我们不得不在一个更加抽象的哲学层面上重新思考我们对人类历史的整体认识。生产技术及人类互动方式的变革在影响社会机制及政府职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呢?